

东亚道教文献的流传与衍变 ——基于《玉枢宝经》插图本的探究

摘要：《玉枢宝经》是神霄派的重要道经文献，自14世纪起逐渐有插图本流行，现存插图本能够按照刊刻地点分为中国版本与朝鲜版本。通过对文献、图像的梳理、探究，可以发现，徐道龄在1333年刊刻的“集注本”被道教内部及当时的统治者认定为正统，并形成“至顺模式”这一相对稳定的配图模式。17世纪出现了并未遵循至顺模式的配图刻本，原因在于特殊的刊刻语境。至顺模式刻本在16世纪中期传入朝鲜，朝鲜编者根据成本、喜好等缘由对相关图像进行重绘，衍变出图像删略与图像改动这两种颇具特色的改绘方式。

关键词：道经文献 《玉枢宝经》 中外交流
道教美术

刘晋*

《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简称为《玉枢宝经》，是北宋末年兴起的神霄道派雷法传统经典之一，通常被用于科仪活动。经文内容为雷部尊神雷声普化天尊受到雷师皓翁乞求，亲自阐述了“至道”“气数”等道教观念，并传授消灾解厄的法门。据称，遭遇灾厄的人通过默念经文，即可得到神明庇佑，解除困厄，心想事成。此前学界对《玉枢宝经》研究不多，主要侧重于版本考证、文本图像解读以及社会历史分析三个方面。

版本考证主要是对《玉枢宝经》版本源流的探究及考证。三浦国雄在《「玉樞經」の形成と傳播》一文中细致梳理了《玉枢宝经》的流传版本，并将其划分类型，¹对后来学者有启发意义；但因成文年代较早，对后来发现的一些重要版本未有提及。关于文本图像的研究是对《玉枢宝经》所存经文、所配插图展开论述与分析，代表论文有尹翠琪《道教版画研究：大英图书馆藏〈玉枢宝经〉四注本之年代及插画考》、尹志华《조선시대 「옥추보경」 (玉樞寶經) 중의신장 (神將) 에 관한 연구》等。尹翠琪对大英图书馆藏《玉枢宝经》四注本及其插画进行了深入讨论，并从图像层面判断其成书年代。²尹志华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玉枢宝经》清刻本以及两册朝鲜刻本作为探究对象，

梳理了这些版本所记载的神将立像名讳及其谱系。³关于社会历史的研究聚焦于《玉枢宝经》对当时社会的作用影响与价值意义，朴钟春（박종천）《한국의 뇌신 (雷神) 신앙과 술법의 역사적 양상과 민족종교적 의미》、⁴李远国《구천응원뇌성보화천존 (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 신앙 연구》两文颇具代表性，⁵较为完善地论述了其时朝鲜社会如何看待、理解并阐释《玉枢宝经》。

根据现存资料，已无从考证《玉枢宝经》作者身世，仅可判断其成书时间大致在北宋末或南宋初。初本仅有经文，14世纪逐渐出现集注本、插图本和忏悔文等多种版本。集注本在原本基础上增加有海琼真人白玉蟾的注释、祖天师张道陵的解义、五雷使者张天君的释文以及纯阳孚佑帝君吕洞宾的赞文，因此又被称作四注本。插图本，顾名思义，即绘制有图像的版本，经文内容或遵循原本，或遵循集注本。《正统道藏》录有《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忏》与《雷霆玉枢宥罪法忏》两部文献，主要内容为乞求天尊宽恕，忏悔过失，故称作忏悔文。现存年代最早的插图本应为大英图书馆藏本，初被大英图书馆研究人员定为元至顺癸酉年（1333）刻本，后来尹翠琪通过梳理该本所载注解及其图像，认为大英

*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道教铜镜整理与思想研究”（项目批准号：23BZJ033）阶段性成果。

** 刘晋，西安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2023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道教美术、东亚美术。



图1 经首扉画（大英本，局部）

本并非至顺癸酉年初印本，而是后印本，当产生于明代永乐朝（1403～1424）或更晚。²

经笔者检索、查阅与梳理，目前能够确定存有十种《玉枢宝经》插图本，按刊刻地点可被分为“中国版本”和“朝鲜版本”两类。插图本所载图像一般有经首扉画、神将立像、护经神像和内文插画四种，多数版本载有二至三种图像类型。经首扉画通常描绘天尊说法场景，是对经文所述对象的点题。神将立像则是展现道教雷部神明形象的插图，应用于科仪场景。内文插画一般位于文本附近，是对文本的图像学补充，旨在以具象形式呈现文本所描绘的宗教世界。

一、中国版本《玉枢宝经》及其图像模式

下面按刊刻年代的先后顺序，将中国七种版本的基本信息说明如下：⁶

Z1-《高上神雷玉枢雷霆宝经符篆》，明永乐朝或以后刊本（尹翠琪判定），本文所选为英国大英图书馆藏本（文内简称为大英本）。经折装。现将全书结构按排列顺序罗列如下：（1）天尊说法图；（2）神将立像，共四十五尊；（3）护经碑刻一尊；（4）诵

经警策；（5）焚香奏启；（6）经文内容及插画，共二十六幅；（7）圆满吉祥灵章；（8）符篆十五章；（9）北极玄天玉虚上相后序；（10）至顺癸酉上元日嗣天师太玄后序及篆印三款；（11）吴越司命三茅主者后序；（12）宝经音训；（13）栴檀神王座下一十五种恼害婴孩之鬼；（14）护经神像（应为赵元帅公明）；（15）牌记。

Z2-《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明嘉靖六年（1527）写本，本文所选为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本（文内简称为天理本）。经折装。现将全书结构按排列顺序罗列如下：（1）天尊说法图；（2）神将立像，共四十五尊；（3）护经碑刻一尊；（4）诵经警策；（5）焚香奏启；（6）经文内容及插画，共二十六幅；（7）圆满吉祥灵章；（8）符篆十五章；（9）北极玄天玉虚上相后序；（10）至顺癸酉上元日嗣天师太玄后序及篆印三款；（11）吴越司命三茅主者后序；（12）宝经音训；（13）栴檀神王座下一十五种恼害婴孩之鬼；（14）牌记；（15）护经神像（应为赵元帅公明）。

Z3/Z4-《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两册，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内府写本，本文所选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文内简称为中图万历四月本、中图万历八月本）。



图2 经首扉画（天理本，局部）





图3 经首扉画（中图万历四月本）

Z3- 第一册（四月）：经折装。现将全书结构按排列顺序罗列如下：（1）天尊驱魔图；（2）护经碑刻一尊；（3）御制金书雷霆玉枢宝经序，大明万历四十三年四月作；（4）诵经警策；（5）开经偈；（6）经文内容；（7）护经碑刻一尊；（8）护经神像（应为马元帅）。

Z4- 第二册（八月）：经折装。现将全书结构按排列顺序罗列如下：（1）天尊驱魔图；（2）护经碑刻；（3）御制金书雷霆玉枢宝经序，大明万历四十三年八月作；（4）诵经警策；（5）开经偈；（6）经文内容；（7）护经碑刻一尊；（8）护经神像（应为赵元帅公明）。

Z5- 《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刊本，本文所选为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本（文内简称为京都万历本）。经折装。现将全书结构按排列顺序罗列如下：（1）天尊说法图；（2）护经碑刻一尊；（3）诵经警策；（4）开经偈；（5）经文内容；（6）九天雷尊宝号；（7）莲座经文；（8）护经碑刻一尊；（9）护经神像（应为温元帅）。

Z6- 《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清光绪四年（1878）刊本，本文所选为中国澳门吴庆云道院藏本（文内简称为澳门道院本）。经折装。首页记“信女张门欧阳氏率男张懋贵敬”，底页记“光绪四年岁次戊寅孟夏吉旦 张门欧阳氏偕男懋贵敬刊”。现

将全书结构按排列顺序罗列如下：（1）天尊说法图；（2）诵经警策；（3）经文内容；（4）宝诰；（5）符篆十五章。

Z7- 《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清刻本，本文所选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文内简称为中图清刻本）。该本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阅览室，尹志华在《조선시대 『옥주보경』(玉枢宝经) 중의신장(神將)에 관한 연구》一文转引其图像资料，故定为插图本。因笔者未能得见全貌，年代亦难判定，仅存目。

根据尹翠琪研究，大英本应为后印本，刊印于明代永乐朝或以后，即15世纪。大英本载有第三十九代天师张嗣成于元至顺癸酉年（1333）所作后序，并有篆印三款，为探究大英本以前刻本提供了重要信息。张嗣成后序称：

玄阳子（徐道龄——笔者注，后同）所遇《雷霆玉经》（集注本），本末如是如是（此处为道藏本原文，大英本作“本末如是”），其必有自来矣。不以自秘，方将梓而广之，其所以与人为善之志甚笃。予虽未识其为人，固已先识其为心，知其非寻常人也。虽然，至道无言，至言无迹，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子既有得于言语文字中矣，推致其功，乃复有得于言语文字外，无宁使人谓子为泥象执文者，是则予之至望也！子其勉之。至顺癸酉上元日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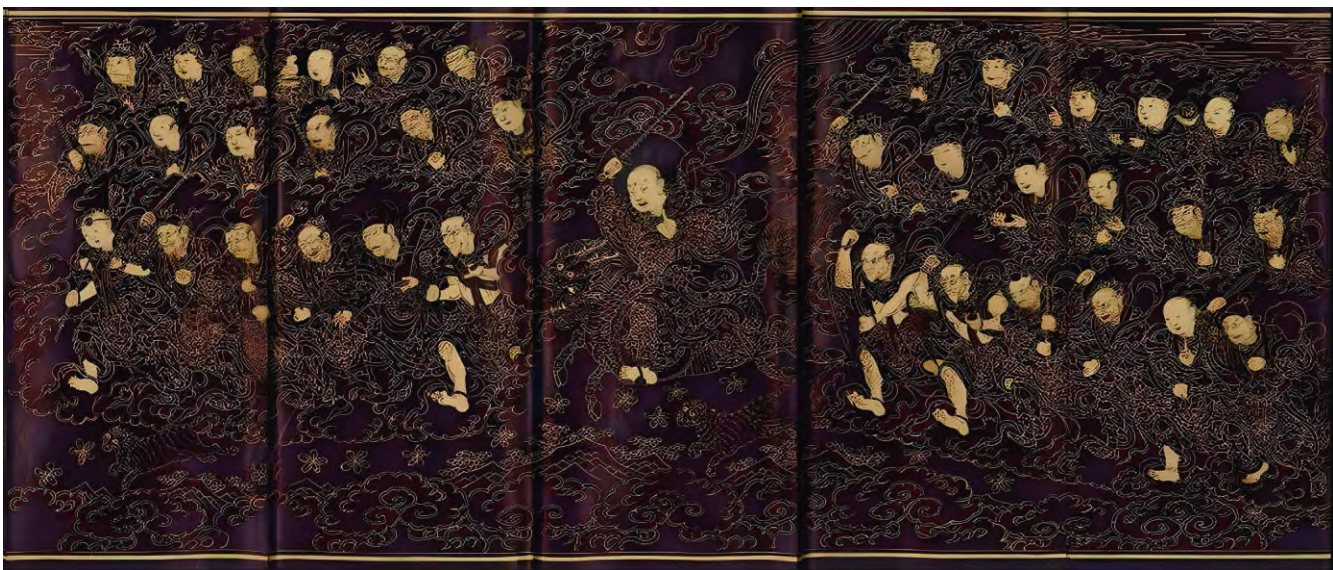


图4 经首扉画（中图万历八月本）

三十九代天师太玄子书（此处为道藏本原文，大英本作“至顺癸酉上元日嗣三十九代天师太玄书”）。

按张嗣成言，徐道龄在“言语文字”中有所收获，故甘愿冒被指责“泥象执文”之风险刊刻《雷霆玉经》（玉枢宝经）。张嗣成时掌江南道教事，所知道经甚蕃，言语间却透漏出正一派并未藏有相关版本，这表明1333年以前应未有集注本流通于世，直至徐道龄刊刻才广为流传。通过张嗣成序后钤有“阳平治都功印”这一表明道教天师身份的印章，能够判断集注本已被张嗣成认可，并已纳入正一道科仪体系。明正统十二年（1447），《正统道藏》刊刻完成并颁布于天下道观，其中收有《玉枢宝经》原本与集注本，反映出官方已经全盘接纳集注本。

然而张嗣成的序文未能说明两个关键问题：其一，没有直接证据能够表明徐道龄所刊至顺刻本（集注本）为插图本，即使至顺刻本为插图本，仍难证实其配图是否与大英本一致；其二，当时是否存有其他插图本，如果存有，其他插图本与至顺刻本是否存有关联。对于这两处疑问，笔者希望另辟蹊径，先以14世纪至16世纪所流传的两种插图本作为探究对象，从而展开较为合理的推测。

14世纪至16世纪流传有大英本与天理本两种插图本，前者应为道教人士刊刻，后者为嘉靖帝御制，然而二者的经文结构、构图形式与整体布局等高度相似。以经首扉画“天尊说法图”为例（图1、图2），其为典型的对角线构图，普化天尊居于画面偏右侧，坐九凤丹霞之宸，手举金

光明如意。天尊面前有供桌样式家具，旁边有麒麟趴卧。供桌面前有一手持笏板的跪状人物，饰有头光，应为雷师皓翁。结合经文内容，扉画所绘事件为普化天尊与十方诸天帝君相会交流，雷师皓翁从“仙众中越班而出”，勃变长跪，以乞求天尊讲述至道真理。考察普化天尊之姿态与手持物，周围侍女所举旗帜及白虎、青龙两君，供桌以五供形式并伴麒麟，道教神明的形体塑造等元素，两图绘制逻辑如出一辙，仅在普化天尊背光处线条、局部神明位置等细节存些许差异。至于神将立像、护经神像、内文插图等类型图像，大英本与天理本均呈现极为相似的绘制风貌，显然同出一源。

尹翠琪指出，用于道经制作的图像必须追求准确，不能出现扭曲和遗漏，完成之后的图像还需要受到道教专业人士的审查。这一观念根植于时人对道教经文神圣性的认识，时人认为道教经文为世界起源之前的“元始之气”所形成，首先以神秘图形展示给神仙，然后神仙将其转述予信众。因此道经图像亦具有神圣性，能够使信徒积累宗教功德，获得神明庇护。如若经文或图像中出现错误，这种效能会有所减损甚至消失，故抄写者往往会被责罚。⁷ 以此观之，大英本与天理本已然遵循一致的经文结构与绘画逻辑，这表明至少在16世纪中叶，《玉枢宝经》已经形成被官方认可并流行于宫廷与知识阶层的图像模式。因其经文结构遵循至顺刻本确立的模式，故这种图像风格体系被称作“至顺模式”。

明万历年间有三种御制《玉枢宝经》流行，绘画风格



图5 经首扉画（京都万历本）

与至顺模式存有较大差异。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刊刻有两册内府写本。四月写本的碑刻强调摄伏妖魔，从而“保扶劫运，万载长春”。八月写本的碑刻主张通过“摄伏群魔”，从而“国泰民安，辅世治平。万亿斯年，延益天龄”。万历四十三年两册写本有经首扉画（图3、图4）与护经神像两种图像类型，经首扉画所绘神将占有短小篇幅，仅有普化天尊以骑乘麒麟姿态呈有全身形象。之所以如此布置，是因为此时爆发“梃击案”，万历帝希望借助普化天尊“弭息百邪”之大能平息梃击案所带来的风波。普化天尊作为驱魔主神，旗下神将权能及神力均为天尊所赐，故而被极力描绘，篇幅极大。其余神将主要跟随天尊驱魔，仅居于衬托位置而不得喧宾夺主。因此，万历四十三年写本不同于一般《玉枢宝经》注重符篆，而是删繁就简，聚焦摄魔效用。

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版本无序文，不过碑刻有文曰：“崑祈宝笈，调泰阴阳，风雨顺时，民安物阜，肃

清内外，康泰眇躬，乂安丕祚者。”刊刻时间为仲春，即二月。结合其时形势，万历四十六年（1618）爆发清河堡之战，明朝决心速战而破后金，从原定万历四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提前至二月二十五日出师，与后金爆发萨尔浒之战。万历四十七年共制三百六十册《玉枢宝经》刻本以下发，应为祈祷战争胜利所用。该版本同四十三年写本一致，仅保留经首扉画（图5）与护经神像，将普化天尊设置于画面中心主要位置并放大体型，其身下绘有麒麟坐骑。相较于普化天尊形象，其余神明则显得颇为娇小。

创作于17世纪的中图万历本与京都万历本并未遵循至顺模式的绘制逻辑，尤其是中图万历本以“天尊驱魔图”类型创作经首扉画，不复为“天尊说法图”。其原因在于中图万历本不是一般道士或信徒所用道经，而是倾注有最高统治者情感色彩的御制经典，其核心价值在于“驱魔辟邪”，故经首扉画强调普化天尊威武霸气的驱魔姿态。京都万历本亦为御制，复为“天尊说法图”，经首扉画篇



幅不大，仅留天尊与左右两名侍女。天尊面前有一名跪状人物，左右两侧共有十七名雷部神将。除侍女外，天尊、跪状人物与雷部神将均绘制有头光，不过以天尊头光为大。同时删去供桌，仅留麒麟。扉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经书功用在于发放给宫廷道士以祈求战争胜利，故要求精简图像，提高印刷速度。因此，17 世纪的中国万历本与京都万历本呈现出不同于至顺模式的绘画风格，可将其称作仪式专用风格体系。

清光绪四年（1878）有一册经折装本，载“信女张门欧阳氏率男张懋贵敬”等信息，应是民间信徒自行刻印并献于道院。其配图粗糙，仅刻极为简略的经首扉画（图 6）。吴庆云道院为正一派散居道士吴致和在清末民初时期所开设，颇受当地民众欢迎。其时民间广泛流传道经典籍，由个人抄写、刊刻而赠送给他人或道院，澳门道院本或是如此。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有一册清代刻本，据尹志华所录神

将立像，应为插图本。以神将立像赵公明为例，能够发现其具有明显的至顺模式痕迹。大英本所绘制赵公明像（图 7）背景覆盖有勾云纹饰，且右上角有一道烈焰纹饰，并不惹眼。其右手所执铁鞭以较小弧度近似直立于胸前，似处于战斗状态。其罩袍同以墨色涂，纹理精致细腻。伴宠黑虎位于赵公明左侧，露出作昂头状的头颅，似仰天长啸，并露出前躯左右两只脚掌。清刻本所绘赵公明（图 8）的执物姿态、罩袍及袖口设计、手掌朝向、风带串联两只脚掌而于左脚掌处呈飘逸形态等均与大英本一致。不过，二者描绘的黑虎略有差异：大英本所绘黑虎头颅为自左向右而仰头，其目光注视赵公明，存有转动姿态；中图清刻本所绘黑虎则为仰头状，无转动姿态，与赵公明相背。清刻本还将赵公明头部之上的祥云略去，仅单独画有一道烈焰线条，不过脚部之下保留有几朵祥云。

综上所述，《玉枢宝经》中国插图本的主要图式为至顺模式，并衍生出两种流变方式。其一为至顺模式体系，包括大英本、天理本及中图清刻本等，其图像以至顺模式为根本，仅在细节处有所差异，变化幅度较小。其二为仪式专用风格体系，包括有万历年间的三种版本，它们因特定背景所作，重视道教主神，删减无关内容，图像颇为独到，具有新意。例如中图万历八月本载护经神像赵公明，其面庞更显老态，手持铁鞭偏左角度而向上，似倚靠在左肩。躯干上部并无罩袍覆身，反而饰有耀眼之盔甲，十分霸气。虽然基本元素与至顺模式一致，但构图形式与细节描绘却自存新意。京都万历本在经首扉画方面对至顺模式有所借鉴，然而在重新绘制时出现“错讹”，例如大英本、天理本《天尊说法图》所绘天尊手持物为玉如意，京都万历本却将天尊手持物改为一笏板状长物，较难理清缘由。澳门道院本向我们展示了民间对道经图像的态度不复宗教人士般虔诚，限于成本及其审美观念，只简要绘制相关图像，保留最为重要的经文内容。

二、朝鲜版本《玉枢宝经》对至顺模式的吸收与改造

目前能够确定在朝鲜刊刻的插图本有明隆庆四年（1570）全罗道无等山安心寺版、清雍正十一年（1733）宁边妙香山普贤寺版、清光绪十四年（1888）鸡龙山版



图6 经首扉画（澳门道院本）



图7 神将立像，赵公明（大英本）



图8 神将立像，赵公明（中图清刻本）

三种，每种版本多有不同印本传世。按此三种版本所载序跋，《玉枢宝经》在16世纪中期传入朝鲜。时有朝鲜官员出使明朝，得一部《玉枢宝经》，藏于家内而未流传。后解元吴切闻之并刊刻于世，成安心寺本，缺变相及经文二张。雍正十一年普贤寺计划重刊安心寺本，至雍正十四年偶得所缺二张，成普贤寺本。光绪十四年，孙元澄、赵复振、金瀛等以普贤寺本为底本，并结合其他版本内容，整理出鸡龙山本。除这三种流传较广的版本，朝鲜还有盘龙寺本、绶州本、佛法研究会藏韩文刻本等，不过这些刻本颇为稀见，留待以后再作撰述。

按刊刻年代先后顺序，现将三种朝鲜版本基本信息说明如下：⁸

C1-《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明隆庆四年（1570）刊印，朝鲜全罗道无等山安心寺版，本文所选为韩国大巡真理会藏本。线装。现将全书结构按排列顺序罗列如下：（1）护经碑刻一尊；（2）符篆十五章插图；（3）诵经警策；（4）焚香奏启；（5）经文内容及插图注释；（6）圆满吉祥灵章；（7）符篆十五章；（8）宝经音训；（9）栴檀神王座下一十五种恼害婴孩之鬼；（10）护经神像（应为赵

元帅公明）；（11）跋文一篇。

C2-《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清雍正十一年（1733）刊印，朝鲜宁边妙香山普贤寺版，本文所选为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本。线装。现将全书结构按排列顺序罗列如下：（1）神将立像共四十七尊；（2）护经碑刻一尊；（3）符篆十五章插图；（4）诵经警策；（5）焚香奏启；（6）经文内容及插图注释；（7）圆满吉祥灵章；（8）符篆十五章；（9）宝经音训；（10）栴檀神王座下一十五种恼害婴孩之鬼；（11）护经神像（应为赵元帅公明）；（12）跋文两篇。

C3-《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清光绪十四年（1888）刊印，朝鲜鸡龙山版，本文所选为韩国大巡真理会藏本。线装。现将全书结构按排列顺序罗列如下：（1）扉页插图；（2）玉枢宝经序：序有两种，第一种为“大明世宗肃皇帝御制序”，第二种为“玉枢宝经原序”；（3）玉枢宝经目录；（4）证赞，瀛壶玄槽子撰；（5）神霄九炁真王真形图说；（6）神将立像及衍图赞，共四十八尊；（7）护经碑刻；（8）仪文；（9）开经赞；（10）八则至心归命礼；（10）焚香奏启及启请颂；（11）经



图9 “沉痾痼疾咒诅冤愆”配图（大英本）



图10 “沉痾痼疾咒诅冤愆”配图（安心寺本）

文内容；(12) 经文十九章及注解；(13) 善功圆满章、吉祥灵章、尊言赞、至心归命礼；(14) 符篆十五章；(15) 栴檀神王座下一十五种恼害婴孩之鬼；(16) 护经神像（其上有文“栴檀神王宝相”，应为错讹，据图像特征及标识应为赵元帅公明）；(17) 真忏悔文集，孙元澄纂述，赵复振编辑，金滄恭校；(18) 音训；(19) 要义；(20) 述旨；(21) 后叙三篇；(22) 跋文两篇。

通过对安心寺本与普贤寺本的对照梳理，二者的诵经警策、经文及注释等内容基本一致，全文结构均遵循至顺模式，不过在配图布局方面有较大改动。其一，中国版本特别注重经首扉画，而朝鲜版本却有意删略经首扉画，将神将立像放在经文开篇。第二，安心寺本保留有两种配图，第一





图 11 天尊驱魔图（安心寺本）



图 12 天尊驱魔图（大英本）



图 13 万法教主、东华教主（左大英本，右普贤寺本）



种是“符篆十五章插图”，置于神将立像以后，正文以前。通过对图像的溯源和整理，笔者发现安心寺本的符篆十五章插图与至顺模式内文插图相似，可能存在渊源关系。下面试比较大英本“沉痾痼疾咒诅冤愆”一章所载配图（图 9）与安心寺本“沉痾痼疾咒诅冤愆章”所载配图（图 10）。图 9 主要描述了天尊（画面上部或中部）降下神力（光束）以解民间疾苦，图 10 则将图 9 所绘天尊及部分人物等颇为显著的艺术元素加以接受并改写。如图 9 左下角两位边走边交谈的民人、右下角“官府判案”的情形等，基本为图 10 所接纳，并加以一定程度的改写，其余插图莫不如是。第二种为内文插图，仅有一幅，呈现为天尊驱魔图（图 11），应系自至顺模式内文插图（图 12）承袭而来。

就目前资料看，朝鲜版本多数遵循至顺模式，能够确定中国至顺模式刻本是朝鲜版本的源泉。中国版本与朝鲜版本之间的差异，有两种原因可能导致：其一，传入朝鲜的至顺模式刻本已经产生变化，安心寺本遵循其变化而进行刊刻；其二，传入朝鲜的至顺模式刻本经朝鲜本地重新刊刻，从而产生一定变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可能并非互斥，而是同步进行，从而造就朝鲜版本的独特形态。

首先，现存多种遵循至顺模式的刻本，这表明相关刻本定然经过不断重刻，重刻则难以避免图像产生轻微变形。然而据前文所述中图清刻本，我们能够发现图像的变形程度极小，且主要集中于伴宠黑虎。对比安心寺本与大英本所载护经神像，两者对赵公明的描绘整体相似，但在细节处多存出入。大英本所绘赵公明头部之上有三道烈焰纹饰，颇为亮眼。其右手所执铁鞭以斜上方角度穿过左臂，作护卫状。其罩袍以墨色涂，颇为简练。伴宠黑虎位于赵公明左侧，露出头颅与前脚掌。安心寺本在背景烈焰纹饰、护卫姿态、墨色罩袍等元素上与大英本存有一致性，但是在交脚襍头与鬚髯的具体绘制、手持铁索的方式（大英本掌心朝下、安心寺本掌心朝上）、黑虎的绘制形态等地方与大英本存有异议。尤其是安心寺本所绘左臂向内延展而似“马步状”，大英本所绘左臂则是自然向下。结合安心寺本刊刻时间为 16 世纪，而此时流行于中国的刻本为大英本与天理本。即使传入朝鲜的至顺刻本配图存有不周之处，但相差程度显然过大。

因此，传入朝鲜的至顺模式刻本可能是与大英本相近的黑白刻本，然而朝鲜编者在重刻时受制于成本，刊刻相对粗糙。以神将立像为例，其绘制原则是随着神明地位的



图14 海瓊白真人（左大英本，中普贤寺本，右鸡龙山本）

提高而更为精细，地位稍低的神明则采用更为粗犷的绘制方式。例如万法教主、东华教主（图13）、大法天师、神功妙济许真君等重要神明的图像及背景几乎没有改动。真人、天君等形象的绘制与至顺模式有轻微变化，如海瓊白真人（图14），其面部朝向和服饰设计基本相同，而蒲扇和袖口的朝向有所不同。对元帅形象的改动较多，如灵官马元帅（图15），普贤寺本在细节上有许多改动，且刻画相对粗糙。之所以如此，缘由或许在于普贤寺本主要是由民间、寺庙信徒共同集资刊刻，聘请画师并非专业人士，因此在绘制神将图像时注重地位高低，以简化绘制流程、降低绘制难度，从而降低成本。

其次，经首扉画在中国版本中具有重要地位，即使是民间刊刻的澳门道院本，虽然配图粗糙，亦保留有“天尊说法图”形态的经首扉画。因此，朝鲜编者应是不了解经首扉画的重要意义，认为其较神将立像、内文插图等缺乏实际效用，结合成本所限，故将其删略处理。以普贤寺本所列神将立像为例，较大英本多列“弘济丘天师”“旌阳

许真君”两尊神像及其名讳，这两尊神像画风与其余神像不同，应为后补。然而“神功妙济许真君”与普贤寺本新增的“旌阳许真君”均指道教净明派所尊奉祖师许逊，编者却将两者独立并设有不同手执，显然误以为二者并非一人。朝鲜文献《惺所覆瓿稿》记载有《张山人传》，“张山人”名汉雄，其父留有《玉枢经》，张山人读书万遍而能呼唤神鬼及治疗疾病。⁹或许在朝鲜民众心中，经文内容较图像更为重要。

第三，安心寺本载有所谓“符篆十五章”插图，而此种配图似乎与至顺模式并不相符。经过反复思考，笔者以为安心寺本所载“符篆十五章”插图并非朝鲜编者改绘，反而更像传入朝鲜的至顺模式刻本“有意为之”。其一，传入朝鲜的至顺模式刻本为朝鲜官员出使明朝所得，考虑到这位官员自藏而未有流传，说明此册《玉枢宝经》并非朝廷官方赐书，更有可能为朝鲜官员自购或与明朝官员、使臣互赠所得。结合安心寺本现存结构，朝鲜官员所得应为在知识阶层内流传较广的至顺模式刻本。根据跋文，安

心寺本为民间、寺庙人士集资刊刻，资金本就匮乏，如若令画师重新绘制，一则花销更甚，二则需要熟悉道教知识的人士指点，否则反而存有风险。因此，朝鲜编者缺乏相关动机将内文插图重绘为“符篆十五章”插图。其二，在至顺模式体系，“符篆十五章”插图主要阐释普化天尊如何“解厄”，能够辅助相关人士理解符篆效用，属于内文插图的重点图像。因此，笔者推测至顺模式刻本在不断流传、刊刻过程中，部分人士为节省印刷费用、推动经典流传，从而对原本篇幅较长的内文插图加以凝练处理，改绘为篇幅更短的“符篆十五章”配图，并列于正文以前，以显重视，朝鲜官员所得即为这种版本。

鸡龙山本较普贤寺本增加有证赞、图说、护经碑刻等十余项内容，均为普贤寺本所未存。结合附存的三篇后叙与两篇跋文，可知鸡龙山本虽以普贤寺本为基础，但博采众长，集其时各类刻本为补卷，内容丰富。就图像而论，此本仅存护经神像与神将立像，并无经首扉画与内文插图。通过参照对比，其护经神像与安心寺本、普贤寺本一脉相承，具有明显的承袭关系，几无改动。神将立像则删繁就简，删去花纹等装饰，更加简约爽朗。

综上所述，朝鲜版本配图是中国版本至顺模式体系在朝鲜的延续。从绘画的整体逻辑来看，朝鲜版本始终遵循至顺模式的基本元素描绘，同时发挥能动性，在细节处进行变动，并延伸出两种改绘方式。其一为图像删略，主要体现在将较缺乏实用性的经首扉画进行删略，对较为重要的“符篆十五章”配图、内文插图（“天尊驱魔图”）与护经神像进行保留。其二为图像改动，主要体现为神将立像与护经神像在细节描绘上的差异，神将立像的重绘原则根据神明地位而有所不同。万法教主、东华教主、大法天师、神功妙济许真君等重要神明几无改动，真人、天君等形象存有轻度改动，元帅形象的改动较多。护经神像则是延续至顺模式以赵公明为护经神明的规则，在保留其基本元素的基础上进行轻微创新。

三、结论

本文以插图本《玉枢宝经》为探究对象，将现存插图本《玉枢宝经》分为中国版本与朝鲜版本，厘清了两种系统的版本及图像源流过程。通过文献分析与图像研读，最终认定徐道龄所刊刻至顺刻本为《玉枢宝经》正统，而这一被称作“至顺模式”的图像范本为后世承袭并适度创新，大英本、天理本、中图清刻本等均从其所出，从而构成至顺模式体系的主要脉络。万历年间有三种御制版本，因其特殊的社会背景及用途，画风并不完全遵循至顺模式，而是有所转变，颇为独特，故而可被称为仪式专用风格体系。以澳门道院本为代表的民间流传插图本因成本缘故，并不注重细节刻画，颇为粗糙，并未遵循较为规范的图像模式。

16世纪中晚期，遵循至顺本及其图像模式的《玉枢宝经》插图本传入朝鲜，渐有安心寺、普贤寺、鸡龙山三种重刻本。安心寺本主要依据传入本的结构及配图，不过编者在重刻时又采用图像删略与图像改动两种形式而重绘图像。图像删略主要指安心寺本将经首扉画删略，仅保留神将立像、内文插图、“符篆十五章”配图与护经神



图15 灵官马元帅（左大英本，右普贤寺本）

像。图像改动是指编者在重刻神将立像时加以“分类”处理：地位较高的神明基本保留原貌，绘制精细；地位愈低的神明改动愈多，颇为粗糙。普贤寺本主要补安心寺本所缺变相及经文二张，全书内容及结构、配图与安心寺本几无区别。鸡龙山本以普贤寺本作为底本，同时参照其他版本，其文本内容增补甚蕃，不过在图像方面删繁就简，更加简约爽朗。

致谢：本文在研究、写作过程中，获西安美术学院范淑英教授、陈磊副教授多次提点。同时得北京大学李淞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尹志华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尹翠琪教授、孝感市道教协会崔振声先生慷慨帮助，查核经籍、图像材料，在此表示由衷感谢。本文曾于2023年浙江大学“中华文明及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全国研究生考古论坛、2024年第一届厄巴纳-香槟大学亚洲研究研究生研讨会(The First Graduate Symposium on Asian Studies at Urbana-Champaign)等学术研讨会进行发表，会中承蒙浙江大学金晓明教授、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客座助理教授余欣(Xin Yu)等专家赐教指正，感谢万分。本文在图像、格式等方面，受河北师范大学崔佳女士积极帮助，特此致谢。

- 1 [日] 三浦国雄：《「玉樞經」の形成と傳播》，《东方宗教》2005年总第105期。
- 2 尹翠琪：《道教版画研究：大英图书馆藏〈玉枢宝经〉四注本之年代及插画考》，《道教研究学报：宗教、历史与社会》2010年第2期。
- 3 尹志华：《조선시대 「옥추보경」 (玉樞寶經) 중의신장 (神將) 에 관한 연구》，《대순사상논총》2014年总第22期。
- 4 [韩] 朴钟春：《한국의 뇌신 (雷神) 신앙과 술법의 역사적 양상과 민족종교적 의미》，《대순사상논총》2018年总第31期。
- 5 李远国：《구천응원뇌성보화천존 (九天應元雷聲普化天尊) 신앙 연구》，《대순사상논총》2013年总第21期。
- 6 本文对道经所进行的结构分析以及大英本《玉枢宝经》的部分文字借鉴于尹翠琪。参看尹翠琪：《道教版画研究：大英图书馆藏〈玉枢宝经〉四注本之年代及插画考》，《道教研究学报：宗教、历史与社会》2010年第2期。中国

七种版本馆藏信息及配图来源如下：Z1-《高上神雷玉枢雷霆宝经符篆》，现藏于英国大英图书馆，藏书编号ORB.99/161。目前已出版，收录于翁连溪、李洪波：《中国道教版画全集》第三卷，中国书店出版社，2019年。本文配图为北京大学李淞教授所赠。Z2-《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现藏于日本天理大学附属图书馆，藏书编号126-イ3。目前未出版，本文配图为孝感市道教协会崔振声先生所赠。Z3/Z4-《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书编号02019。目前未出版，本文配图取自中国国家图书馆。Z5-《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现藏于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藏书编号930532。目前未出版，本文配图取自日本京都大学图书馆。Z6-《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现藏于澳门吴庆云道院，后被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扫描，藏书编号940182。目前未出版，本文配图取自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Z7-《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书编号140969。目前未出版，本文配图为中央民族大学尹志华教授所赠。

- 7 尹翠琪：《Image and Efficacy : Frontispieces to the Wanli Emperor's Yushu jing》，《Artibus Asiae》2015年第1期。
- 8 朝鲜三种版本馆藏信息及配图来源如下：C1-《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现藏于韩国大巡真理会，藏书编号未知。目前未出版，本文配图为中央民族大学尹志华教授所赠。C2-《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现藏于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藏书编号ハ06 02475。目前未出版，本文配图取自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C3-《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现藏于韩国大巡真理会，藏书编号未知。目前未出版，本文配图为中央民族大学尹志华教授所赠。另大巡真理会藏本未载有神将立像，不过韩国文化财厅刊有两册安心寺本《玉枢宝经》，分别藏于首尔中浪区与原州古版画博物馆，这两册均载神将立像。结合普贤寺本跋文认为安心寺本“缺变相及经文二张”，未言缺少神将立像。因此，笔者认为大巡真理会藏本为缺少神将立像的残本，原刻本载有神将立像。不过因能力所限，笔者仅得见大巡真理会藏本，故以此版本为探究对象。
- 9 [李氏朝鲜] 许筠：《惺所覆瓿稿》卷八，刻本，日本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藏号199294）。

（责任编辑：李红娟）